

对抗与后马克思主义的偶然性逻辑

——从拉克劳、墨菲的“antagonism”谈起

孔明安

偶然性逻辑是以拉克劳、墨菲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运行逻辑。对抗是后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概念。如何理解对抗与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构成了后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笔者曾就“‘Articulation’与后马克思主义的偶然性逻辑（《现代哲学》2006年第3期）做一探讨。然而，在后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中，对抗与后马克思主义的偶然性逻辑之间存在着更为密切的内在逻辑关联。不仅如此，对抗还构成了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理性的基础。有鉴于此，本文试图从拉克劳和墨菲的“对抗”概念入手，对对抗与偶然性逻辑之间的内在关联做一简单探讨，并在此基础上做一简评。

一 “对抗”的基本含义及其规定

对抗是拉克劳、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一个核心概念。对抗的含义及其规定直接与后马克思主义的偶然性逻辑，包括“外在构成”等概念有关。同时，对抗一词还涉及到拉克劳思想发展的微妙变化，诸如从《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策略》到《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中，从“对抗”到“错位”（dislocation）的变化。因为拉克劳与墨菲在《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策略》中，对“错位”概念虽有所提及，但还不构成主导趋势；然而，在《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以下简称《新反思》），拉克劳则花巨大篇幅对“错位”概念加以论述，似有用“错位”取代“对抗”概念之意。不仅如此，拉克劳甚至直接以“错位和对抗”为题来论述这两个核心概念。可见，对抗与错位这两个概念对于理解拉克劳与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概念的重要性。

何谓“对抗”，对抗错位之间的区别何在？对抗与“对立”和“矛盾”又有什么样的关系，这是理解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关键。现在，我们逐步展开对对抗的分析。

《在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策略》（以下简称《领导权》）一书有关“对抗与客观性”一节中，拉克劳、墨菲还是对“对抗”给予了简单的规定。他们“把一切客观性限制的‘经验’都具有的某种精确的话语存在的形式（form）”称之为“对

抗”。【《领导权》，英文，p. 122. 1985】

乍一看，拉克劳、墨菲的这一定义颇难理解。对抗怎么会与“经验”、“客观性的限制”和“话语存在”联系起来？其实，在这个简单定义之前，他们对此还是有一个简单的解释。因为此前他们都在谈“链接”、“话语”和话语背景下的主体范畴的变化，包括对社会客观性的否定，因此，他们就问到，“是否存在着某种‘经验’和话语形式，其中它们所展现出的不是‘超验所指’的持续的推延，而是推延的虚无和任何稳定差异的最终的不可能性，因而，也即任何‘客观性’的不可能性？”对此，他们给出了肯定的回答，这一回答就是“对抗”。因此，从拉克劳、墨菲对“对抗”的简单规定可以看出，对抗是某种经验或话语形式，它与“超验所指”无关，与“稳定差异”相反，它指向客观的不可能性。显然，由此定义，我们可推知，拉克劳、墨菲的“对抗”概念是在其“话语”背景下经验的存在形式。

为了更好地理解拉克劳、墨菲的“对抗”概念，必须将“对抗”与近代哲学的“对立”和“矛盾”概念加以仔细的区分。这一点，拉克劳、墨菲在《领导权》一书中也做了详细的说明。”。这里，必须强调的是，拉克劳所谓的对抗（antagonism）既不同于黑格尔概念辩证法意义上的对立和矛盾，也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客观的辩证的对立统一意义上的“对立”和“矛盾”。因为上述两者强调的都是对立或矛盾的内在的特则，唯一的差别在于一个强调的概念运动之间的内在的对立及其相互转换，另一个强调的则是识客观事物之间的内在的矛盾及其相互转换。

对抗概念是拉克劳、墨菲在批判意大利哲学家科莱蒂（L. Colletti）等人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在给出对抗的简单定义之后，拉克劳、墨菲首先指出，对抗问题并不是新问题，而是在历史和社会中被一直广泛研究的问题，它涉及到从马克思到各种形式的社会“斗争理论”，它们都是对有关对抗问题的思考和解答。然而，拉克劳、墨菲认为，以往有关的各种对抗论点大都集中于对抗的描述及其对抗原因的探究上，而很少触及到该问题的核心，也就是什么是对抗关系？它又包含了什么类型的对象中的关系？为了深入地探讨这一问题，我们就必须注意拉克劳、墨菲对对抗（antagonism）、现实对立（real opposition）和矛盾（contradiction）这几个概念的区分，从而凸现“对抗”范畴在其政治哲学思

想中的重要性。在《领导权》一书中，拉克劳、墨菲对上述三个概念做了非常细致的区分，并把此概念的划分追踪到了康德、黑格尔、马克思那里。他们首先从科莱蒂(Lucio Colletti)对康德的“对立原则”与“逻辑矛盾范畴”的不同的论述开始；在科莱蒂看来：

对立原则，其相应的公式是 $A \dashv\vdash B$ ；其每一方都肯定了自己，并相互独立于对方；矛盾范畴，其对应公式是 ‘ $A \dashv\vdash \text{非} A$ ’：在这一公式中，一方与另一方的关系耗尽了双方的实在性。矛盾则发生在命题领域，只可能在逻辑概念的层次上成为矛盾。相反，第一种类型的对立（即现实的对立原则）出现在现实对象领域，因为现实对象没有由于它与其他对象的对立而耗尽自身的特性，它有自己的现实性，独立于其对立物只有在逻辑概念层次才可能进入到矛盾之中。…L .科莱蒂然后得出其结论说，由于唯心主义哲学家黑格尔把是把现实还原到概念上，把矛盾引入到现实之中，因此，这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并不一致，马克思主义是从精神之外的现实的特征出发。据此，马克思主义陷入了可悲的混淆，它把对抗(antagonism)视为矛盾(contradiction)。科莱蒂的目标则是在现实对立(real opposition)的基础长重新阐释对抗。[E. Laclau, C. Mouffe, 1985, p. 122-123]

拉克劳、墨菲紧接着指出，科莱蒂是从一个二难选择开始其论述的，即事物要么是现实的对立(real opposition)，要么是矛盾(contradiction)。因此，在科莱蒂那里，只有两类实体：即现实的对象((real objects)和概念(concepts)。在他的假设和分析中包含着思想与实在的分离。他是从一个惟一的二难选择出发的，即要么对立，要么是矛盾。但是，拉克劳、墨菲并不认可科莱蒂对实在与概念的二分，也不认为科莱蒂的分析有助于对“实在的对立”与“矛盾”两个范畴的解释，更无助于对“对抗”范畴的解释。在拉克劳、墨菲看来，对立是两个实体之间的碰撞，它服从的是实证的物理规律的物质性事实，但并不一定构成真正的对抗，如两辆汽车的“碰撞”。我们并不能简单地把实证性领域的“对立”简单地移植到社会领域。而对抗则主要是发生在社会领域，如警察殴打工人群众等对抗性的活动；那么，什么才是对抗呢？

为了理解“对抗”概念，除了上述所谈到的“对抗”与“对立”的领域不同之外，即对抗主要指的是“社会对抗”，还必须联系“矛盾”概念的规定来加以说明。拉克劳、墨菲认为，绝对不能把这两个范畴，即“对抗概念等同于矛盾”

[1985, p. 123]。他们的这一观点既是对他们在书中提到的埃奇利和埃尔斯特的相关观点的否定,也是对拉克劳早期把此两个范畴混淆等同的纠正。更为重要的是,对抗也不是现实中的对立,也不是矛盾,即不是矛盾或对立的现实化。比如各个不同的宗教信仰学说,(如基督教、佛教和伊斯兰教)都是相互矛盾的体系,但它们却并不一定必然在现实中产生对抗,因为“矛盾并不必然意味着对抗性的关系”。(p. 123)对矛盾和对抗的这一区分涉及到了“对抗”的产生条件及其内涵。正是在这里,我们还得须联系“对立”和“矛盾”来对“对抗”加以进一步的阐释。拉克劳、墨菲认为,

在矛盾的情形中,因为A完全地是A,非A才是矛盾(以及不可能性)。而在现实的对立的情形中,正因为A也完全是A,它与B的关系才产生了客观决定的作用。但在对抗的情形中,我们面对的是不同的情况:“它者(Other)”的存在阻止我成为一个完整的自我。这一关系并没有从完全的总体中产生,而是来自于其建构(constitution)的不可能性。它者的存在在逻辑上是可能的:它存在着,所以它不是矛盾,但它也不属于因果链条中的一个肯定的差异环节,因为在这种情形下,这一关系将通过每个存在的力量而形成,而且没有对这一存在的否定。……只要存在着对抗,我就不能成为一个自身完整的存在,不过与我对立的力量同样如此:它的客观存在是我的非存在的一个象征,而且在此方式中,它充满着防止它变成完全确定的多样化含义。现实的对立是可确定、可定义事物中的一个客观关系,矛盾同样是概念之中可定义的关系;而对抗则构成了所有客观性的有限性,即它显现为局部、不稳定的客观化。[E. Laclau, C. Mouffe 1985, p. 124-125]

从上述引文中,可以看出对抗不同于对立和矛盾的地方。简而言之,在拉克劳、墨菲看来,无论是现实的对立还是矛盾,它们都服从决定和被决定的规律,也即服从事物的内在的必然性规律,然而,对抗却并不服从这一决定性的规律。如拉克劳、墨菲所言,现实的对立在诸种事物中的一种客观关系,也即一种决定的,可规定的;矛盾在概念中也同样是可规定的;只不过一种服从的现实的、实在的决定性和可规定性,另一种服从的是概念的内在的规定性或决定性。至于对抗,则与上述两者都不同,其中的根本原因在于在对抗中,对抗的双方由于对方的存在,从而使得对方不能成为完满的,或完整的。例如,就农民与地主的关系

而言，农民之所以是农民，是由于农民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耕田种地；但如果农民被地主剥夺了农田，那么，农民就不成为农民了，这时，由于地主的存在，农民就难以构成自身的存在，其存在自身就遭到了否定，如此就形成了农民与地主的对抗。因此，在这一例子中，可以看出，农民自身的构成受制于“它者”，即地主的否定。而这一关系并不是固定的，而是变动，而且不同于对立和矛盾的关系。这里，必须注意：对立和矛盾并不必然导致对抗，只有在一方的存在遭到否定的情况下，才会导致对抗的产生。正如农民的身份存在遭到否定后，他不再构成为农民，从而形成对抗一样，现代工业社会工人与资本家的关系也是类似的关系。假设工人为 A，资本家为 B，A 与 B 在现实中是对立的，但只要他们的身份不变，即工人还能维持工人的身份，资本家还能维持资本家的地位，那么，他们就可以相安无事，可以维持生产和再生产；但是，如果因为各种原因，如物价飞涨、劳动时间延长或劳动强度的增加，特别是由于企业失业导致工人失业，工人的生存地位遭到了严重的威胁，那么，此时，工人与资本家就从原来的对立状态转化为对抗的状态。因为这时的工人不能再得以保持其工人身份，甚至有可能流离失所，等等。至于矛盾，在拉克劳看来，则是概念之间的内在的相悖，同样也不能将之混同于对抗。因此，在人类社会，“既存在着没有对抗的矛盾，也存在着没有矛盾的对抗”，这是两者并行不悖的社会现象，也是对抗得以成立的前提。

至此，我们应该能够看出拉克劳、墨菲的主要意思：即“对抗”是完全不同于“对立”和“矛盾”范畴。因为在前两者中，无论是“矛盾”还是“对立”，其最终都走向了“客观的决定性”，或“对立中的统一”，然而，在“对抗”的情形中，情况却并非如此，甚至完全相反，因为对抗“面对的是不同的情况：另一个的存在阻止我成为完整的自我”。这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在上述引文中，对抗概念的理解，特别是对抗构的构成过程中涉及到了“它者”，它与法国精神分析学家拉康的“它者”理论有关。拉康在他的精神分析理论中，提出了精神形成的三个阶段论：即镜像阶段、象征阶段和实在阶段。当然，对拉康有关精神分析的理论仔细研究不在本文的分析之列，但拉康对儿童进入到“象征阶段”后的有关特征的描述，非常有助于对拉克劳、墨菲有关“对抗”思想的理解。拉康认为，在象征的能指链与个体之间并不是和谐相处的

关系，而是一个某种“对抗”的关系；能指链作为一个大“它者”，对个体构成了巨大的压制。在这里并不存在所谓的“平等”和“对话”，而完全是一种不平等的“对抗”关系。作为能指链的“它者”成为“施暴”者的一方，而作为被动的个体，则成为了反抗“施暴”的另一极；两者之间构成了某种“对抗”的关系，对抗使得任何一放都不能使自身成为完满，即不能构成一个完满的存在。显然，从上述引文，我们可以看出，拉克劳、墨菲充分吸取了拉康有关精神分析中“它者”与自我之间的关系，即自我受到“它者”的摧残和压制，而自我又对“它者”进行反抗等。近代传统哲学所谓的主体性则是在个体对“它者”的反抗中才能达到体现的。如此，作为对立的双方之间构成的两极，绝对不是黑格尔哲学中所谓的“对立统一”规律在发挥作用，而是某种非本质论，非决定论的偶然性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此，反对本质论，反对决定论，反对必然性，就成为拉克劳、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必然选择。

二 对抗的特征及其偶然性逻辑

从拉克劳、墨菲有关对抗的基本规定，及其与对立和矛盾的区分看，对抗具有如下特征。这些特征构成了他们所谓的后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主题或概念。具体如下：

首先，对抗的非客观性特征是，或曰对抗的社会性特征。注意，这里所谓的社会性，并

不是指“society”，而是指“the social”。从拉克劳、墨菲对对抗的有关定义中可以看出，既然对抗是“经验”的话语存在形式，那么，显然，对抗显然是社会性的，即它不是先天的概念之间的矛盾，也不是超验的，而是受制于话语。在拉克劳、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中，话语理论是其学说的核心，他们所谓的话语虽然复杂，但其最大的特点是吸收了福柯的话语理论，因此，其话语是“社会性的话语”。由此，对抗的社会性也即对抗的非客观性，或是对客观性的有限性。对于这一特征，拉克劳给予了明确的说明。他说：

对抗根本不是客观的关系，而是表明客观性的有限性的一种关系。……作为最终弥合的不可能性的见证者，对抗是社会有限的“经验”。严格而言，对

抗并不是内在于社会，相反是外在于社会；或者说，对抗构成了社会的有限性，构成了自身完满构成的社会不可能性。”（Laclau and Mouffe, 1985, p. 125）

对于对抗的这一特征，拉克劳在《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以下简称《新反思》）中也给予了同样的说明。他说：“对抗是所有客观性的有限性（limit of objectivity）”。

从这一定义看，对抗并不具有某种客观的意义，相反，对抗阻止了客观性本身的构成，或是对客观性的限制。我们知道，近代哲学是将客观性与必然性联系在一起，说“客观性”几乎是“必然性”的代名词。说对抗与客观性相反，显然，这就意味着对抗与偶然性密切相关。事实也的确如此，拉克劳、墨菲的“对抗”概念的确与他们所谓的“偶然性逻辑”相关。或者说，从对抗可以直接引申出后马克思主义的偶然性逻辑。

其二，对抗是建立在从属关系到压迫关系的转换或形成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虽然对抗在社会中到处存在，但还是对社会中的关系加以区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确定从属关系向压迫关系的转换。在现代社会中，存在着大量的从属性关系，如上级与下级之间的隶属关系，特别是政治生活领域中隶属关系，这一关系典型地表现在我们所列举的农业工人与农场主之间，工人与资本家之间。显然，按照拉克劳、墨菲的对抗理论，农业工人可以与农场主，工人与资本家之间是一种从属关系，工人必须隶属于资本家的工厂，并受制于资本家的管理，可以短暂地“和谐相处”，只要他们之间的关系没有转变为“压迫性的关系”。否则，就必然产生社会性的对抗。他们是这样说：

“我们的中心问题是确认反对不平等斗争，并挑战从属关系的集体行动浮现的话语背景的环境。也可以说，我们的任务是确认从属（relation of subordination）关系转变为压迫（relation of oppression）关系，从而使从属关系自身构成为对抗之场所的条件”（E. Laclau, C. Mouffe, 1985, p. 153）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涉及到了“从属关系”、“压迫关系”、“支配关系”和“对抗”等有关问题，因此，简单地澄清一下这几个概念的关系，将有助于对抗概念的理解。拉克劳、墨菲认为，从属关系就是雇员屈从于雇主，或传统社会中女性屈从于男性的那种关系。但是，在理解这几个类同概念之前，首要的是要抛弃有关对主体看法上的“人的本质”和“统一化主体”的人类学假定：

“如果我们先天地确定了主体的本质，那么，所有遭到否定的从属关系自动地会成为压迫性的关系。如果我们拒绝了这一本质主义的观点，那么，我们就需要对“从属”和“压迫”加以区分，并对从属转变为压迫的准确条件加以解释。…”
(E. Laclau, C. Mouffe, 1985, p. 153-154)

因此，在理解从属关系向压迫性关系的转变过程中，必须抛弃有关主体的“本质主义”的假定，即认为主体的特性或身份是不变的看法。这一要求与他们的反本质主义观点是一致的。如对工人阶级而言，其作为一个主体，在不考虑具体的背景下，就想当然地认为工人阶级所处的是从属地位，并会自动地联合起来与资本家进行斗争，并已经与资本家构成了“对抗”关系。对于这一论点，拉克劳、墨菲认为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他们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工人与资本家之间虽然存在着附属性的关系，但并构成为对抗关系。要从附属关系转变为对抗关系，是需要一定的条件的，或者说，是需要一定的外在性的条件；这一条件就是使二者之间的这种有差异的、附属性关系消失的条件，它才构成了处于从属关系的双方的真正的对抗。所以，“明显不同主体身份之间的平等替换则是对抗出现的条件” (E. Laclau, C. Mouffe, 1985, p. 159) 拉克劳、墨菲说：

“我们把压迫关系称之为使自身转变为对抗场所的从属关系。最后，我们把支配关系 (relation of domination) 称之为这样的一系列从属关系，即从外在于从属关系的社会行动主体观看来，或依据其判断是非法的从属关系，以及最终与确定的社会形态中实际存在的压迫关系相符或不符的从属关系。因此，问题就是去解释从属关系如何构成为压迫关系的。显然，处于自身设想中的从属关系并不能成为对抗关系：（原因在于）简单地说，从属关系在社会行为主体之间建立是一系列的差异身份，而我们早已知道，把所有社会认同建构为实际差异体制不仅不是对抗的，而且会为所有对抗的消除提供理想的环境（我们将不得不面临着一个被弥合的社会空间，这里，所有的平等都会被铲除一空）。正是在从属主体身份的实际差异特征遭到颠覆这一程度上，对抗才会出现。“农奴”、“奴隶”等概念并不标明其自身的对抗身份；只有基于不同的语境形态下，如“天赋人权”，才能颠覆这些不同范畴不同的确定性，从属关系才能被构建为压迫性的关系。这

意味着：如果不存在中断从属话语的语境的“外在性（exterior）”，就不存在压迫性的关系。（E. Laclau, C. Mouffe, 1985, p. 153-154）

由此，我们看出，由从属关系转变为压迫关系，是有一定的条件的。当“从属主体的实际差异特征遭到否定”时，对抗才会出现而支配性关系则仍是，从属关系，只不过它是某种非法的，与压迫关系或相符，或不符的从属关系。也就是说，在一个从属性的关系下，并不一定会产生对抗，只要不是来自中断特征的“外在性”的介入，此种从属关系就一直处于“支配性”的关系之下。只有当“外在性”介入到了与原来支配性的从属关系之下，并使从属关系转变为压迫性的关系，那么，对抗就有可能产生了。而一旦产生对抗，才能进入拉克劳、墨菲所谓的“领导权”的理论的语境之中。

从“从属性关系”到“压迫性关系”的转变，直至因“外在性”而导致“对抗”的出现，就成为理解“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关键点。这里，我们至少可以得出如下几点：（1）拉克劳、墨菲对“外在性”的强调构成了其“后马克思主义”的一大特征，而其另一个核心概念，即“外在构成（constitutive outside）”也正是在此意义上而言的。显然，对“外在性”的强调，使“后马克思主义”在此点上完全不同于黑格尔的矛盾内部的对立统一观点，并直接否定了事物通过矛盾的对立辩证运动而导致对抗和发生变化的观点。它也是我们在前面提到的“偶然性逻辑”的根据之所在。因此，把握“从属性关系”到“压迫性关系”的转变的关键是理解的“外在性”依据。（2）使从属关系转变为“对抗”的“外在性”，在“后马克思主义”看来，其实就是话语的语境的转变，这当然也包括其中的话语转变。也就是说，充当“外在性”力量而介入的是某种“话语性”的力量。由此，我们就可以看出，或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理论，具体而言，其“对抗”的思想，其实也是与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即其“话语理论”密切相联。

其三，从对抗与现实对立和矛盾的不同，看以得出对抗是建构性的，或构成性的，而且这一建构是外在的，而不是内在的，即外在建构或外在构成（constitutive outside）。外在建构遵循的偶然性的逻辑，而非辩证法所规定的那样的事物的内在逻辑。说对抗具有建构或构成性（constitutive）的特征，其实说的就是对抗的“人为性”特征，也就是偶然性特征。为什么呢？因为按照

拉克劳、墨菲对对抗的规定,对抗既不服从于辩证法矛盾的概念之间的内在规定,也不服从现实对立的外在的决定,而是由于“它者”的存在而导致了自身存在否定。然而,面对着“它者”对自身存在的否定,自身或个人并不是束手就擒,而是要与“它者”展开对抗或斗争,而这一对抗或斗争过程就是对抗的“建构”或构成特征。在《新反思》中,拉克劳说:

在黑格尔的矛盾概念中,既包含了社会对抗,也包含了自然变化的过程。这一可能性的前提是:矛盾被理解为概念的内在运动,现实的理性是制度合理性,任何的“外在性”(outside)都为规定所排除。另一方面,在我们的对抗概念中,我们面临着“外在构成”。正是“外在性”(outside)阻碍了“内在性”(inside)的认同(同时,它也是其构成的先决条件)。至于对抗,否定并非来源于认同自身的“内在性”,相反,从根本上来说,它是来自于外在的;因此,正是这一绝对的事实性,才不会回头指向任何潜在的理性。……由于客观性预设了所有因素(element)的肯定性,因此很容易看到,“外在构成”本身所固有的否定性的存在就意味着社会从来不可能把自身完全建构为客观次序。【《新反思》,英文, pp. 17-18】

显然,对抗的构成性特征是通过外在的否定,而不是内在的否定而达到的。所以,对抗的这一外在建构的特征与近代理性哲学是不相容的,所以,拉克劳才说,外在构成自身才不会指向潜在的理性,而是意味着“社会从来就不可能把自身构建巍峨客观次序”。对于对抗的外在建构特征,拉克劳更给予了具体的规定。他说:这一“外在”(outside)是一种绝对的外在,并没有一种与“内在”共享的标准。对对抗的“外在性”特征的最初界定可以建立在“偶然性”(contingency)概念研究的基础上”【《新反思》,英文, pp. 17-18】。

所以,外在建构的“绝对外在”特征,必然从逻辑上蕴含了对抗的偶然性逻辑,它既是对辩证法的内在必然逻辑的全面否定,也构成了后马克思主义政治霸权的基础。在拉克劳看来,矛盾是内在的,是无法克服的,它们之间存在的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而对抗则是此消彼长,是一个建构的过程,因而是需要主动的外在介入,或是“霸权”或领导权介入的。正因为对抗的存在,才为霸权或领导权的外在介入提供了条件和契机。仍以资本家与雇佣工人之间的关系而论,拉克劳人认为,由于资本家要榨取剩余价值,显然,工人与资本家他之间存在着雇佣劳

动与资本之间的对抗；然而，这一对抗却并非是矛盾，而是一种“无矛盾的对抗”。这种无矛盾的对抗使得工人与资本家之间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相安无事；相反，如果双方之间是一种矛盾的对抗，则就是一种你死我活的斗争。然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现实说明了这种“无矛盾的对抗”现象的存在及其合理性。所以，拉克劳说：“对于无矛盾的对抗，内在的关联是缺失的。对抗的解决（或是非解决）完全依赖于现实的和偶然的历史”【《新反思》，英文，p. 8】。

由此，从对抗及其外在建构的特征看，对抗与后马克思主义的偶然性逻辑之间的关系也就一目了然了。对抗的偶然性逻辑，意味着对抗不是传统的二元基础上的矛盾对立，而是多元基础上的对抗，是对近代本质主义哲学思想的彻底颠覆。这是后马克思主义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可以说，对对抗概念的规定及其特征的把握，是理解后马克思主义偶然性逻辑的核心所在，也是建构以霸权或领导权为核心的关键。因为只有在对抗及其偶然性的逻辑基础之上，才有可能展开以“链接”为基础的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重构。当然，后马克思主义的对抗概念的分析不止于此，对抗概念的理解还与另一个重要概念，即“错位”（dislocation）密切相关，限于篇幅，我们就不在此详论了。

简评

对于拉克劳、墨菲的对抗思想及其偶然性逻辑，它们在其后马克思主义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然而，我们还是必须清楚，对抗的理解及其偶然性的逻辑是有其应用的限度的。下面我们对此做一简要的评论

首先，我们必须肯定后马克思主义的对抗范畴及其偶然性逻辑的意义。按照拉克劳、墨菲的规定，在人们所处的社会中，“既存在着没有对抗的矛盾，也存在着没有矛盾的对抗”，这是后马克思主义偶然性逻辑存在的基础。只有将矛盾范畴一与对抗范畴分离出来，并进一步揭示“无矛盾的对抗和无对抗的矛盾”现象的存在，才有可能提出后马克思主义的偶然性逻辑。所以，对对抗和矛盾范畴的区分和澄清就显得尤为必要。同时，它也是拉克劳等人将后结构主义理论应用于现代社会现象分析的重大的理论进展和突破，是他们对现代社会矛盾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和引申。就此而论，后马克思主义在哲学上的理论意义是无言自明的。

其次，后马克思主义的对抗范畴及其偶然性逻辑有其严格的应用界限或范畴，如果不加以适当的限定，则会造成非常荒唐的解释或结果。在拉克劳、墨菲看来，对抗及其偶然性逻辑的应用领域，主要局限于现代政治斗争领域和政治生活中。特别是偶然性逻辑本身，更是必须限制在现代西方政治运动的领域内，例如西方的女权主义运动；生态和环保运动；西方左派运动。如果不加以适当的限制，将之应用于一切社会领域，认为在人们生活的一切领域都存在着对抗及其偶然性逻辑，则会导致典型的偶然性逻辑的泛滥，以及许多“滑稽”现象的解释。此外，即使在政治生活领域，政治活动是否完全遵循“偶然性逻辑”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无论如何，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探讨，对于破解近代哲学的本质主义思维，将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或后结构主义思潮的结合，提供了非常有意义的探索。

最后，我们要指出的是，后后马克思主义的对抗及其偶然性逻辑导向了拉克劳、墨菲为代表的以“对抗”为基础的现在政治哲学思想的产生，并形成了不同于现代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争的另一种政治哲学思潮，也即后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思潮。在以对抗和偶然性逻辑消解近代理性和本质主义的基础上，他们试图提出以“链接”为目标多元激进的民主理想构想，从而形成一种“新”的大众民主理性，这也就是拉克劳和墨菲在新千年之后努力建构的“民粹理性”（popular reason）

（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Antagonism and the of Contingent Logic of Post-Marxism

—Starting from the Laclau and Mouffe's concept of “antagonism”

Kong Ming-an (Center for Western Marxism Study,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CASS)

ABSTRACTS

Antagonism and Contingent logic are the two key concepts proposed by E. Laclau and C. Mouffe's Post-Marxism in their famous works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1985) and *New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of Our times*(1990) and so on. However, 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ncept antagonism and of contingent logic? This paper tries to focus on the two concepts to answer above question and comments about it.

In the 1ST part of the paper, it focuses on the delimitation of the key concept of “antagonism” from Laclau and Mouffe's works. According to Laclau and Mouffe, the definition of antagonism is as follows: “this ‘experience’ of the limit of all objectivity does have a form of

precise discursive presence, and this is antagonism” (in *Hegemony*, 1985, p.122) this definition is related the proposition, i.e., the impossibility of ‘society’, or ‘the impossibility of closure’, which are the viewpoints of Post-Marxism by L.M. . . . In addition to the above viewpoint, the definition of antagonism is related with “the form of experience’ of the limit of all objectivity”, and “form of discursive presence”, which means that antagonism i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iscourse and may be contrary to “transcendental signified”, or the objectivity of societ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ociety defined by modern philosophy, Hegelian philosophy and traditional Marxism.

According Laclau and Mouffe, antagonism has been widely studied in historical and sociological literature from Marxism to the various forms of ‘conflict theory’. Based on the inquiry into Italian Marxist Lucio Colletti’s analysis of the specificity of social antagonism related with the categories of “real opposition’ and ‘contradiction’, Laclau and Mouffe draw their conclusion about the distinction among the three concepts: antagonism, real opposition and contradiction, in which antagonism is deferent form real opposition and contradiction. Thorough their hard studies of the three concepts, Laclau and Mouffe point out that t he most important features of the antagonism is that “there exists antagonism devoid of contradiction” and “there exists contradiction devoid of antagonism”, which leads to the birth of contingent logic of Post-Marxism

In the 2ND part of the paper, it focuses on the some characteristics of antagonism in modern society and its key relation with contingent logic. These characteristics includes (1) “limit of objectivity”, namely, the impossibility of society to oppose the definition of objective law of positive viewpoints. (2) The formation or realization of antagonism is based on the transition from “relation of subordination” to “relation of oppression”; in which different relation corresponds with different contradiction or antagonism result at the different conflicts in society. (3)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nstitutive outside, but not inside for the antagonism, in which the “constitutive” and the “absolute outside” lead to the contingent logic of Post-Marxism.

Finally, this paper comment on the antagonism and contingent logic of Post-Marxism in terms of three perspectives: firstly, Laclau and Mouffe do “develop” the theory of traditional Marxism on the basis of antagonism and cotangent logic by combining Marxism with the method of deconstruction from J. Derrida, etc... Secondly, it the contingent logic must be applied carefully within a certain area, such as political fields, the left debate realms and Western society. Moreover, Laclau and Mouffe’s contingent logic should be studied in detail from now on. Lastly, antagonism and contingent logic do pave the way for the articulation practice of the Laclau and Mouffe’s idea of hegemony, and philosophy of politics for Post-Marxism,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long debate between individual liberalism and *communitarians*. *Furthermore, the denial of traditional reason must be called on the demand to rebuild the popular reason, which Laclau and Mouffe’s tries to studies recently.*